

MEDIO-TRANSLATOLOGY

译

谢天振 著

介

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MEDIO-TRANSLATOLOGY



译介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译介学 / 谢天振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2 (2000重印)

ISBN 7-81046-526-0

I. 译… II. 谢… III. 文学—翻译—理论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21733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85425300 (总机), 3505181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岳永红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5 字数 250 千字
版 次: 1999年2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3次印刷
印 数: 3 2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6-526-0 / H · 561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序一

贾植芳

天振把他刚完成的专著《译介学》的小样拿来给我看，问我有无时间给他写篇序言，我当然是一口答应。

近几年来，经常有中青年朋友送来他们的书稿，希望我帮他们写序，我总是乐意地答应。序写多了，我有时就以“写序专业户”自嘲。然而话说回来，写序虽然花掉了我不少时间，我却是乐此不疲，因为我觉得为中青年朋友的著作写序，实际上也是一个与中青年学者交流思想的很好机会。在写序的过程中，我也从他们的著作中掌握了不少当代学术界的新信息，看到了不少新思想，也学到了不少新知识。眼前这本《译介学》就是如此。

对于不搞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来说，译介学也许还是个比较陌生的术语。事实上，译介学也确实是从七十年代末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崛起才逐渐为国内学术界所了解的一个新的文学研究术语。所谓译介学，据天振介绍，从宽泛意义上说，就是指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所进行的一种跨文化研究。随着当前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已经有学者预言，这种研究势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学

11/27/12

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天振自九十年代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译介学的研究,至今大约已发表二十余篇有关译介学的论文,还为好几本比较文学的教材撰写过有关译介学的专章。前几年台湾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我也曾为该书写过一篇序。该书出版后在海外颇得好评,认为是国内翻译研究中的“开创性的”著作。如今他又推出了他的专著《译介学》,可见他的研究更加深入了。我没能来得及细读天振送来的全部小样,但我前后大致翻阅一下,重点读了其中的几章,就已经能强烈感受到书中透露出来的一股当代学者的学术锐气,感觉到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以及他独特的研究视角。

天振的研究,虽然称作翻译研究,但是他并不局限于、或者说几乎就不讨论某字某句如何翻译如何处理等一些语言转换的具体问题。我的感觉是,天振的研究,与其说是翻译研究,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学研究,一种文化研究。譬如,本书第三章谈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认为任何翻译总是存在着创造性的叛逆现象,他说正是这种创造性的叛逆延长了原作的生命,赋予了原作以第二生命,许多杰出的作品正是有赖于这种创造性的叛逆才得以流传于世。这里,尽管谈的是翻译问题,实际触及的还有对外来文化的移植和接受问题,甚至还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接受问题。再如,第四章有一节在讨论文化意象的传播问题时,提出一直被国内翻译界视作“错译”、“乱译”典型的赵景深先生翻译的“牛奶路”^①,从译介学的角度看反倒比译成“银河”、“天河”还更为正确。这里涉及的也已经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如何透译的问题了,而是触及到了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意象的错位、文化意象变形和文化接受等一系列文化问题了。

作为一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师和研究者,我对本书的

第五章《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和第六章《翻译文学史的名与实》最感兴趣。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除理论外，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组成。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有人曾把翻译文学与我们自己民族的创作比喻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我以为这个比喻极为形象贴切。但有些人却看不到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大作用（其实翻译文学的作用又何止于中国现代文学呢，譬如佛经翻译文学，不是对我国的古代文学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吗？），一直对翻译文学抱有偏见，总觉得翻译文学要低民族创作文学一等，还把翻译文学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使得翻译文学，如同天振在书中所说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弃儿”。现在天振从翻译文学的性质、地位、归属等方面，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翻译文学与民族创作文学之间的关系，指出，“对翻译文学的理论界定，不仅牵涉到人们对翻译家及其劳动的评价，它对中外文学交流史、翻译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都有重要的直接意义。”他从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从翻译文学作品的国籍判断依据等方面的分析着手，令人信服地指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可以说是对文学翻译家的创造性劳动的最有力的肯定，也是对那些对翻译文学抱有偏见的人们的最好的回答。

我还特别赞赏天振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他认为，翻译文学史究其本质，应该是一部文学史，而作为一部文学史，它就应该具有其他文学史一样的三个基本要素，也即作家、作品和事件。他还进一步提出，翻译文学史应该有对翻译文学作品在译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分析和评论，翻译文学史里的“作

家”应该不仅仅指的翻译家，还应该包括那些“披上了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他把翻译文学史看作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文学影响史和文学接受史。这样一些观点应该说是抓住了翻译文学史的本质的，是道前人所未道、很有见地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收集了大量国内外关于翻译文学史的编写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材料，尤其详细地考察了自本世纪三十年代阿英撰写的《翻译史话》以来的我国自己在编写翻译文学史方面的实践，其中包括五十年代末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编写的、从未正式出版过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编写翻译文学史的具体设想，这就表明天振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不尚空谈，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这样的学风我觉得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在我的印象中，国内像《译介学》这样，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大量丰富的实例，把翻译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评述，从而得出与文学史的编写、中外文化的交流等有直接关系的重大结论的著作，恐怕还没有过。《译介学》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外处于学术的前沿，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也同样处于当前学术发展的前沿（这一点，熟悉最新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恐怕比我更有发言权）。《译介学》的出版，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新层面，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我对它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是为序。

1998年11月于上海寓所

① 二十年代末，赵景深先生据英译本翻译契诃夫小说《万卡》时，把其中的Milky Way两词译成“牛奶路”，引起当时文坛的一场风波。

序二

方平

我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大量介绍海外小说,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进入改革开放的今天,曾多次掀起文学翻译高潮。在行将为二十世纪送行之际,回顾一下经历了百年风云的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以翻译作品的林林总总,翻译队伍的人才辈出而言,尤其是拥有说得上世界上最庞大的读者群(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像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等,印数都在百万册以上),我们在文学翻译上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是令人瞩目的,也许足以列入世界翻译大国之一吧。

然而相对于翻译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我们在翻译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却显得很不相称,落后了。谈到文学翻译,最受关注、形成讨论热点的,往往是怎样为文学翻译建立起一种规范,一套准则,从而有了一个有所遵循的努力方向。早在世纪初翻译前辈严复提出了“信、达、雅”;傅雷在五十年代总结了他丰富的翻译经验,提出了“舍形似而求神似”,都在翻译界产生很大影响,直到今天仍然为许多译家津津乐道,奉为圭臬。

为了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发达,促使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这传统的、务实的研讨自然是有益的,有其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浓厚的兴趣始终徘徊于语言层次上,只着眼于两种符号系统在转换过程中的操作性、技巧性的一面,那么即使有所争议、辩论,甚至会议上爆出了面红耳赤的交锋场面,却还是关起门来局限于文学翻译这一圈子内部的波澜。说到底,毕竟会限制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元化思维和多角度的学术视野。这传统的、脚踏实地的、学以致用用的讨论,“只缘身在此山中”,就不免显得单薄、局促些了。

另一个更使人深有感触的遗憾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翻译文学在我们文坛上几乎没有它的一席之地。遥想解放前,众多名家、大师,像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都是一身而兼两任,在奉献出自己的杰作的同时,又通过译笔,把海外的许多优秀作品介绍过来。鲁迅更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译文》(1934—1936),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在当时反封建、反官僚、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平等自由民主的历史阶段,前辈文学家同样重视先进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思想战线上所能发挥的呼唤和鼓舞的积极作用。优秀的译作可说曾经光荣地和进步的创作并肩作战。

解放后呈现了另一番光景。创作和翻译各司其职,从此两下分家了。对于作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听从号召,怎样写出面向工农兵的好作品;而翻译界则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队伍,较之解放前,译文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可是以“政治标准第一”(其实往往是唯一)的要求来衡量外国文学,就难了。它能歌颂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吗?能紧跟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吗?不能。这样,译作和创作,外国文学和遵命文学之间,即使不说存在着一条鸿沟,也像大瀑布似地显示出一个不

小的落差。面有惭色的翻译文学，虽然受到读者欢迎，只能靠边站一些，退居为边缘文学了。

为了繁荣文艺创作，历年来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长篇、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评奖，自有一番热闹欢腾。更显得门庭冷落的是翻译文学，从没它的份。只有极少数译作，例如杨绛先生根据原文翻译的《堂吉珂德》荣获奖章，但这份殊荣并非来自文艺领导的另眼相看，而是西班牙国王有感于译者为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特地向她表示的一份敬意和感谢。

我大半辈子从事外国文学介绍工作(译、评、编辑)，只想尽力之所及，作好自己的本分工作，于愿足矣；年事又高，已安于冷冷清清的命运；但还是衷心希望社会上对于认真负责的文学翻译工作者的精神劳动多一分尊重，少一些使人寒心的讥讽。

可喜的是近年来很有一些值得欣慰的情况可以记述。《红与黑》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经典名著，半个世纪来出现了十来种新旧译本，在中国译坛上已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艺术流派，其间的是非得失，有待细与评说。1995年，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得到《文汇读书周报》的大力支持，就读书界十分关注的名著复译问题，不失时机地发起了一场面向社会、有读者参加、历时半年的关于《红与黑》汉译的讨论和争鸣(以书面形式为主)。它规模大，历时长，涉及面广，讨论热烈，可说是我国解放以来文学翻译界前所未有的盛举，相信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1997年，中国作家协会打破成规，第一次为近几年来的优秀译作颁发文学翻译奖，并为二十多位作出一定成绩的老

翻译家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这是明确认可了文学翻译工作者在我们的文化建设方面同样作出了一份贡献。

最后,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读到了谢天振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在翻译理论研究上有开拓性意义的《译介学》书稿,它带来了国际“翻译学”上许多新信息,行将在年内问世。

什么叫“译介学”?这在我国学术界可能还是一个较陌生的新名词。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如何进行转换的实际问题不再是它的兴趣所在,关于不同的翻译方法、不同的译文,它无意作出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它关注的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失落、变形、扩伸、增生等等;以及文学翻译在人类跨文化系统交流的桥梁作用,它所具有的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呈现出文学比较研究转向文化比较研究的一种明显趋势,而翻译文学恰好为跨文化系统研究提供了最理想的研究园地。因此着重于比较文化的“媒介学”也相应地在比较文学范畴内成为国际上越来越受注目的一门新发展的学科。

天振先生是一位思维活跃、治学勤奋、多年致力于比较文学研究、取得很多成就的学者,又是一位有心人,近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讲学,总是注意搜集和积累有关资料,因此当他熟练地运用他掌握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把一部翻译文学史看成了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文学影响史而加以深入研讨时,翻译文学本身的性质和价值就在这宽广的文化背景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这部“译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过去认为已有定论的看法,现在有了重加审视的必要。

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Milky Way”一词,一向认为无须

思索,应译作“银河”;赵景深曾译为“牛奶路”,成了中国译坛尽人皆知的“极端荒唐的笑话”。但如果认识到“Milky Way”在原作中不是作为天文术语来使用,而是来源于希腊神话的一个文化意象,那么一向认为正确的译文“银河”就构成了文化错位,而长期受到耻笑的“牛奶路”倒是有其可取之处了。

“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所引进的一个命题,作者用专章讨论,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谈到文学翻译,立即会想到“翻译者,反叛也”这一句来自海外、广为流传的名言。翻译工作者都能体会到这句话中的讥嘲口气而心有不甘。对于以认真严肃自勉、把“信”和“忠实”看作文学翻译第一要义的译者,最怕的就是译文出错,而“错误”和“叛逆”在我们心目中,不分彼此,同样可怕又可耻。现在作者提出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并引用了法国专家的论述:“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见 137 页)

作者又举口头文学为例,说明“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见 141 页)口口相传的口头文学正是由于积累了一代又一代的“创造性叛逆”,而变得越来越丰富充实。再加上作者从中外翻译作品中举引了大量有关的例证,最后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见 140 页)

今后我们在文学翻译本身的范畴内探讨翻译艺术,仍然要谈到“信”和“忠实”,对于我们翻译工作者,这可是一个带有神圣性的永恒的主题,但是看来有必要作深入一步的考虑了。

作者又进而区分创造性叛逆为无意识型和有意识型，并提出了“误译”这一值得注意的命题，他说：“任何一个严肃的翻译总是尽量避免误译，”但是“对于比较文学来说，误译有时候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因为误译反映了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与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流中的阻滞点。误译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见 151 页）“也许更有研究价值的是有意识的误译。”（见 201 页）

我揣想，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误译”可以视为和“有意识型叛逆”相对应的另一种提法吧。在两者后面都透露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歧。譬如说吧，玄奘译佛经，以忠实确切著称，但是日本学者中村元则指出，佛法禁止纳妾，而受儒家观念影响的玄奘视纳妾为当然，因此把佛经里的“妻子”译成了“妻妾”。^①

如果在两个东方古国间的文化交流尚且不免产生沟通上的“阻滞点”，那么在差异更大的东西方之间，加上历史发展阶段有先后的错落，又是涉及在“性”这最敏感的区域，就更容易诱发“创造性的叛逆”了。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一对山盟海誓的苦命鸳鸯只能做一夜夫妻——朱丽叶盼望着夜色降临，挂一条软梯在楼窗前，她的新郎流亡之前，好爬进闺房和她度过难解难分的一夜；这会儿一盘软梯还没解开，还在她手里，她感叹道：

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
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文）

这话不免让人纳闷，思想本可以自由飞翔，何须借软梯来牵引，做桥梁呢？原文是：

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

男女幽会欢合的场面也会出现在我国才子佳人的戏曲中,像《西厢记》的“酬简”,《牡丹亭》的“惊梦”;羞羞答答的大家闺秀,只宜半推半就,自始至终是一个哑角,哪能无所忌讳地说出“登上我的床”呢,于国情不合。由于受到我国几千年礼教文化的干扰,前辈翻译家悄悄地把“床”改为得体得多的“相思”,顾不得因而产生了经不起推敲的语病。

原文下句表达了在热恋中的少女渴望和已属于她的新郎在肉体上也和谐地结为一体;而朱译“独守空闺的怨女”的形象,把灵和肉的爱淡化为缠绵的精神之恋了。“处女”“怨女”在这里都属悲苦之词,但前者强调的是被剥夺了享受应有的性生活权利,而对东方的“怨女”,这却成了难以启齿的淫思。在“有意识的叛逆”后面,性忌讳、性压抑的民族心理积淀,无意识地充分流露出来了。

跟文学翻译实践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有分量、有指导意义的建设性文学翻译批评还不多见,这也是一个方面的缺憾吧。常见到的一些译评往往比较偏重于挑出译文中的一些疏漏、失误;这自然是需要的,但还不能说批评的职责尽在于此了,文学翻译的消极的一面看得多了些。因此读到本书深入地探讨翻译创作自身的特性以及和文艺创作的共性这一章时使人感到极大兴趣。文中许多有意味的例证说明:文学翻译不仅延长了原作的艺术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见 140

页)还指出在翻译文学史上有些成功的译作甚至胜过了原作。我很有同感,还可以说,优秀的译文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原文(甚至是本民族的作品)有更好、更确切的理解(因此能更好地欣赏)。可以拿我自己为例。

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一些“笔杆子”创造了我国所特有的一种“批判文学”,同时发展了一套特有的批判用语,像“树欲静而风不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等。后一句指一种错误思想的形成由来已久,我是领会的;但对具体意象是怎么一回事,却不甚了了。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南方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黄河上下,顿失滔滔的那种北国风光从未见识过,因此可笑地以为这是形容倒挂在屋檐下的冰柱足有三尺长!直到去年有机会读到巫宁坤先生用英语撰写的自传《沧海遗泪》(A Single Tear)中译出了这句大批判用语,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三尺”并非长度,而是指大河冰冻的厚度。要是没有译文的点拨,我这一辈子对祖国的一句成语将误解到底了。

综观全书,可以这样说吧,是新兴的属于比较文学分支的“译介学”,而不是传统的翻译学,首先把一代又一代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文学翻译上所积累的成绩、取得的成就,提升为可以和小说、戏剧等创作并列的一种文学样式:“翻译文学”。长期以来我们惯常使用的是“文学翻译”,以示有别于“科技翻译”、“口头翻译”在翻译工作内部不同范畴的工种。现在“译介学”在宽广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名词:“翻译文学”,意不在工种属性标志,而着意于身分的归属。这新名词看似得来全不费工夫,却是学术上的深思远虑,为了文学翻译的更上一层楼,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文艺园地内诸多创作样式中,应该给翻译文学留有一席之地。

作者把翻译文学的定义、范畴、创作特性、归属等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学术性问题提出来,而尤其着眼于最关重要的归属问题,这可说是全书的核心问题,也是历来讨论文学翻译最有远见的学术见解。作者明确地提出了“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见 247 页)不把翻译文学包括在内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不完整的中国文学史。最后,在结束这一章时,作者语重心长地向学术界呼吁道:“也许是到了我们对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并从理论上给予承认的时候了。”

本书论点鲜明,丰富生动的一系列例证又有力地支持了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世界其他国家文学史上少有的。……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几个主要文学样式的诞生与发展,如白话小说、新诗、话剧等,翻译文学都起了巨大的、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见 31 页)

翻译文学对于本土文学的影响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作者回顾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以两章篇幅论述佛经的翻译一扫两晋南北朝虚浮矫揉的文风,“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见 249 页)著名学者闻一多持相同的见解:佛经的宣讲促使我国古代小说与戏剧的诞生。(见 246 页)

论证周密的第五章最富于挑战性,章名就是:“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争取承认,这既是面向社会成见的挑战,更是目标坚定、振奋人心的号召。边缘文学只能是翻译文学目前的处境,常使人戚戚于怀,本文一开始就谈到了这遗憾。读了这一章,深有感受之余,不禁自问:假使我也具有那样活跃的文思、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深入钻研的治学精神,

掌握着这么丰富充实的资料,像作者那样,我也能写下“争取承认的文学”那么观点鲜明的一章,登高一呼吗?自知之明使我只能承认:我顾虑重重(何况见不及此)。文学翻译已让人够瞧不上眼了,怎禁得起再惹人讥嘲:“看,插上一根孔雀羽毛的乌鸦,竟然摇摇摆摆妄想混进孔雀的队伍里来了!”

看来一种鲜明有力、富于挑战性的论点的提出,不仅需要扎实的学识(功力),同样重要的是,为了真知灼见,具有敢于面对世俗之见的胆识。正是在这点上,作者使我尤为钦佩。作为受了启发的后知后觉者,我乐于就自己所知,对翻译文学和创作文学间的密切关系略作一些补充,以为响应。

莎士比亚的案头有一段时期,想必常放置着他时常翻阅的一个译本:诺斯(Thomas North)的英译《希腊罗马名人传》(1579),这是他老人家一系列罗马悲剧取材的重要来源,英译本中有些段落甚至直接搬到一些戏剧场景中。《名人传》是古希腊史学家普卢塔克(约46—120或127)的巨著,先有法译本,诺斯的英译实际上是从法文的转译本,如果没有法译者、英译者的共同努力,后世就无缘欣赏辉煌绚烂的《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慷慨悲壮的《居里厄斯·凯撒》等一系列古罗马悲剧了。

如果要我举出我最喜爱的我国古诗,我不会忘记提到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极目苍苍,宽广无际的景象如在眼前。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鲜卑族(当时还是我汉族化外的“番邦”)的一首民歌,据《乐府广题》:“本鲜卑语,易为齐音”,原来《敕勒歌》是一首译诗,却已完全和本土文学融为一体,早已写进了我国文学史而无异议。

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陈思和教授谈当代外国文艺时有这